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2.021

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

李晓虎

(榆林学院 文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摘要:关于“礼”与“史”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熊十力在评价柳诒徵的史学著作《国史要义》时,指出了柳诒徵“言史一本于礼”的特点。柳诒徵还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以及发表在《学衡》杂志上的10余篇文章中,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他力图揭示中国史学与经学互为贯通、儒学即史学的文化特征。柳诒徵“以礼释史”思想背后的五个学术理论就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皆从史出,礼由史掌,史官秉笔直书之法受到了礼经根深蒂固的影响,礼经之精义贯穿于史之所载的典籍文献,以及史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在于弘扬“礼”。

关键词:以礼释史;国史要义;礼经;史官;儒学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2-0142-06

《国史要义》的写作乃缘于抗战内迁时期中央大学研究院“教授进修课程”的讲授,柳诒徵分别论述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等十个专题,经整理将其出版,汇成《国史要义》一书^①。柳诒徵在书中提出了“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的观点。不仅礼贯穿于全史,而且礼对于史书的主旨、编纂之法、内容取舍及功用,都具有统摄性。

一 一切学术皆从史出,儒学即史学

关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和流变,柳诒徵在其著作《中国教育史·科学皆世官世学》中有所论及,他提出了“古代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观点,也即天下道(学)术本于一。至于为何官有学而民无学,柳诒徵指出了两个原因。“一则惟官有书,而民无书。”“二是官有礼、乐、舞、射诸科之器具,而民无其器。”由此,“学术专为官有”^②。这也是“官学之制,由古代至春秋初未之变”的原因。后来的学术裂变,发生于“百家争鸣”时期,则是由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引起的。

虽然官有学而民无学容易理解,但一切学术又为何皆由史出,仍然耐人寻味。柳诒徵则是从

史官制度来论述这一问题的。

第一,“史,记事者也”。在《尚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中可以得到佐证。由于古代史籍源于史官的记载,由此就可推论“史官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之政书”。柳诒徵认为这是“吾史专有之义”。在此也能做出推测,史官几乎掌握着全国的文化资源。

第二,诸子思想,皆由史官而来。《汉书·艺文志》中就记述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等。因此,柳诒徵提出了“天下学术皆从史出”的观点有一定的依据。

第三,儒学即史学。上面已提到诸子思想也即天下学术皆从史出,而史学又形成了“为史以礼”的传统,礼又是儒学的核心,故有诸子思想是从儒学中分裂而来的结论。如老子是周朝史官,所以儒道同源。墨学亦循《诗》《书》,其“非攻、兼爱”体现的民本、利民的思想,与儒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墨家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

收稿日期:2019-10-16

作者简介:李晓虎(1982—),男,陕西神木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文化史研究。

①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374页。

②柳诒徵:《中国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版,第29页。

和音乐,因为这样会害民时、伤民力、耗损财物。所以,墨学本于儒学,墨学为儒学的一个分支,是有依据的。法家也明显带有从儒家分裂出来的痕迹,如管仲虽被认为是法家思想的鼻祖人物,但孔子对管仲亦非常推崇,可以从“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看得出来。而且,管仲“礼义廉耻,人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思想,是儒家所全面接受和认可的。后来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和李斯,均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弟子。柳诒徵对商鞅才略有微辞,认为法家初不如此。从更深层面来说,“法”其实就是对“礼制”的细分及强制维护而已,法不可能离开礼而存在。

从以上事实来看,柳诒徵“一切学术皆从史出”及“儒学及史学”的观点,在学术溯源上能够站得住脚。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从“百家争鸣”到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至“魏晋玄学”“宋代禅学”,其实都夹杂着不限于“儒道佛”等不同流派的思想,不同流派之间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融合与裂变。

二 礼由史掌

有文字以来,由于施政教民之用,“盖古有惇史,记载长老言行”“殆有惇史记载善言善行可为世范者”,进而发展为“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由此就要讨论清楚史官记史的原则、方法与礼的关系,以及史官能够掌礼的原因。

(一) 史职与礼:史官的职分以“礼”划分

在《国史要义·史原》中,柳诒徵谈到,“史之初兴,由文字以记载”。记事之职,即为史官。周代是史官制度的确立时期,《周礼·春官宗伯三》中,将“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称为五史,五史的职责,又划分为“执礼、掌法、授时、典藏、策命、正名、书事、考察”八类,柳诒徵称“归纳于一则曰礼”。“最古之礼,专重祭祀,至周则益崇人事”。这从“吉、凶、宾、军、嘉”五礼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而礼的范围,所旨极为宽泛,除对天神、地祇、人鬼祭祀的仪式之礼外,法制刑章也被囊括在内。有学者称,“最终发展成了还包括政治、经

济、军事等制度的礼”^①。这就为史官的职分是以礼划分找到了源头和依据。

(二) 史权与礼:史权高于君权,史官的权力来自于执“礼”

史官的权力即为史权。但“史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史之权威”,而在于史官能“秉笔直书”。柳诒徵揭示出了支撑史家秉笔直书的儒家政治学说。他首先针对刘知几等人从史官个人品质的角度表彰史书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他们是“止知重个人之气节,不知究古史之职权也”。通过追溯周代五史职掌,柳诒徵指出“吾国史权之尊”就像“他国司法独立之制度”。史官不仅掌官书典策,史之权威对臣民也能发挥类似宪法的效力,甚至能限制君权。如君王虽居高位,但君权仍要受到代表“大公”的天道的制约,即“天子失度,史可据法以相绳”,这是“史权之高于一切”^②的关键,因而史权在终极意义上高于君权。这种史权的实现,一是史官以所掌握的礼法为道德判断和秉笔直书标准,君王所行之事一般要自觉符合礼的规定;二是史官依据事实记载君王的是非功过得失,留作后世议论,君王为避免留下恶名而使其行为自觉符合礼的规范。

(三) 史联:史官参政及史官掌握全国之政书

“史联”是“纪、传、表、志”体编纂正史的方法。柳诒徵认为纪传体彰显了中国史学传统体裁的独创性,而纪传体编纂的精心妙用就在于“史联”,“不联无以为组织”。这表现在史书的记载“若干时间,若干地域,若干人物,皆有连带关系”^③。

如汉武帝作为一时代之中心人物,事迹很多,不能完全付诸记载,所以在史书的“纪”“传”“表”“志”中骈列,是适宜的。这是由于“每一事有纵贯横通之联络”,“每一人各有个性、共性之表见”。所以在史书记载中,错综离合的事实,散见在文章中的多处,“有整齐杂语,或略或重复者”。又如孔子事迹,既见于《史记》的《周本纪》《秦本纪》《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公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等本纪、世家,又见于“年表”。从体例上来看,却有

①吴贤哲:《从礼经看礼的起源、功用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孔子研究》1996年第2期。

②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39页。

③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102页。

“大书特书不一书”的不同。对于同一性质,有数十数百处记载的地方,则有“表以列之,志以祥之”的方式,通过“表”来补纪传记述详细而缺乏完备的弊病。这样可谓相得益彰,而能见记载之事件的全体。

柳诒徵赞誉道:“纪传表志之体之善,在于人事时空在在可以表著其联络。”推之“史之有联”的根本则在于“官之有联”,根据史官掌官书以及史官可以参政的实际情况,所以史官在记载历史时,史书才出现了“详略繁简”的情况。对于这种关联,就符合举世公认的中国历史富有政治性的这一论断,而此种政治经验自然与儒家之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 史官秉笔的准则:以礼驭史

虽然前文已交代史官皆礼官,史出于礼,因而史书中也必然会渗透礼。礼在史书中的体现还表现在史官在史书编纂中遵从礼、阐发礼、维护礼,这三者分别对应着柳诒徵《国史要义》的三个篇章:史例、史义和史统。

(一) 史例:史书的编纂遵从“礼”

史体是指史书的外部形式或内部结构,主要有纪、传、表、志几类。史例则是笔法运用、文辞修饰、行文风格等史书的编纂规范。如史书内容的“去取、差等、联散、序第”的原则,就本于礼,它们皆可以看作是史例的体现。以《春秋》编年体来说,有“未有无故而书”和“凡褒贬无关于天下之大故不书”的特点。其“书、不书、故书”即可见“去取、差等”的史例所在。以《史记》纪传体来说,有“非天下所存亡不著”的特点。而同一人物、事件会在多处出现,但详略不一,又可见“联散、序第”的史例所在。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史例,称有三十六例。朱熹的《通鉴纲目凡例》,将史例归为十九类,“曰统系、曰岁年、曰名号、曰即位……曰灾祥”,徐乾学的《修史条议》,也指出包含“分合、繁省、补遗、互见”等史例。

如在记述方面,惯用春秋笔法,善恶必书。对于前史记述不当之处,后史必从而正之。纵使当朝人撰本朝之事有主观偏向的嫌疑,后史也会加

以纠偏。在褒讥贬抑方面“必本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礼,以定是非”。在用词方面,同是祭祀,用词有“祠、酌、尝、烝”的不同;同是田猎,用词有“苗、搜、狩、猕”的差异;同是死,用词有“崩、薨、卒、不禄”的区别。这种细致的凡号名目的不同,实质都与“礼”有关。在名号方面,如《史记》关于“本纪”“世家”的划分,“列传”中“外戚”“宦官”“佞妄”“酷吏”“奸臣”等的定名,以及“名臣”“卓行”“孝友”“忠义”的裁度,其评判标准皆由礼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史官所书早有礼经以为载笔之标准”^①的结论。

柳诒徵认为,史例为我国所独创,“他国史家莫之能先”^②。对于这一说法,有些学者并不认同,“史例亦可见西方史书”^③。关于史例的发展,柳诒徵提出“始于《易》之爻辞”,至《周官》,有了“官书之体例”,再至孔子,形成了“一经之通体”。清代的王闿运提出“《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柳诒徵评价其“片言居要”,他们都从源头上认为史例出自“礼”,“去取、差等、联散、序第”的背后的依据就是“准情度理,褒贬予夺”,它们都是礼的集中体现。这也是为何柳诒徵认为“史例权舆礼经”的由来。

(二) 史义:史书重在阐发“礼”的内涵

史书的主旨也即史义。史义是中国史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史学三要素“事、文、义”之一。在柳诒徵看来,“义”是用来判断史事的标准。孔子所说的“正名”,即是以义为衡量尺度的。

“史所重者在义”,而“义”既包括家族之伦理,如父子、兄弟、夫妇之义;又包括国家伦理,如君臣之义、公与私等。同时,“史义”有正有变,公与私、义与不义并非截然无关的,公之中有私,私之中有公;义之中有不义,不义之中有义,是“未易画分”的。“史义”所追求的是“生民之本”和“德义之府”。

柳诒徵对“天子”的界定颇有见地,认为群私之总和谓为天子,而天子是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人。这种“公天下之义”的思想便出自《周官》。对于秦汉以来的帝王,往往仅属于私天下的系列,仅可谓“王”,不可谓“天子”。柳诒

^①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10页。

^②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51页。

^③刘建民:《〈国史要义〉史例观的比较考察》,《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徵所倡导的史学的“义”,不是为一国一族的福利,而是合天下为一家仁义的。柳诒徵通过史义的阐发,就为其关于“史统”的理论埋下了伏笔。除此之外,“史联”和“史例”的书写方式也都是“史义”的发挥,这在本文中亦有论述。

(三) 史统:由史而国,为国以礼,政权的合法性与否以“礼”为判

史统是一种国家思想,是对中国历代统治政权的评价。邓郊在其著作《史统》中,将中国历代政权系谱,分为“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①五类。柳诒徵则是从“民族精神与种族角度肯定了正统论”^②,认为政权合法性的归属问题应是从全民族的立场考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这种思想在孟子那里有相当多的体现。例如,孟子认为诛杀残暴之君是无可厚非的。至于如何评判它是否是正统政权呢?柳诒徵认为,“衡统一之时代,必以道德为断。三统五德,不必拘一姓之私。而无道者虽霸有九州,不得列之正统”^③。如秦始皇残暴无德、王莽篡汉、汉献帝有亡国之责、武则天是女人,这些帝王都不合乎“礼”,因此虽在其位,而不被认可,不得在帝王庙中受到祭祀,这些政权也都不应是正统。由此可以看到,政权的正统与否体现出了强烈的道德评判,其中的论断不乏有合理之处,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对武则天单纯的以性别原因作为取舍的标准,而不问其政绩功过,便体现出了“史统”论的有待改良之处。但深层次来说,柳诒徵的“史统”较之其他史家又有新的发展,其着眼点主要在于中国“大一统”的国家理想,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色彩,而不是简单的是非、道义之判。

柳诒徵对一个政权“正统”与否的关注,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适逢中国遭受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又不得人心。之前,龚自珍“尊史”的主张,也强调了一国之历史与一国之存续的关系:“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淹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柳诒徵基于中华文明传祀不绝的历史,又

从“正闰”之辨出发,探讨了中国的存续问题。柳诒徵称,“华夏之人,服习名教,文儒治史,不能禁世之无乱,而必思持名义拨乱世而反之正。国统之屡绝屡续者恃此也”^④。在他看来,一切不符合名分的事物都将是暂时的,而合乎礼的东西才可以长久。他作此言论,也恰是其追求“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义之正”的正统标准,从其“屡绝屡续”一词中,能看出其持有国家必将一统的希望与远见。不仅如此,在早于《国史要义》近20年的《中国文化史》中,柳诒徵就已言明了“实则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迥迥相属,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⑤,他坚信中国不会灭亡。从另一角度来说,若抛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个人情节,那么,柳诒徵的正统论思想仍然值得学界做一番新的讨论。

四 史的旨向“史化”:对“礼”的继承与弘扬

《说文解字》中解释“化”为“教行”之意,而“史化”也蕴含着史学所应具备的教诲人和感化人的功能。

在柳诒徵看来,中国的习俗无不受到历史的浸染,如“工作勤劬,贸迁贵信,处事咸知讲理,教子恒其成人。重贞淑而贱淫邪,守风气而耻攘窃”等等,“此皆吾之史化”。而在读史和著史的过程中,读者必然要发现史义所在,所以读者要识史,读者在读史的过程中,又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历史的熏陶,受到了史的教化。而著史者,若不具备史德,不能以礼为法度,则无所运笔。

(一) 史家执德以驭史

章学诚认为史德是“著书者之心术”。刘咸忻将“史德”诠释为敬恕,“敬即慎于褒贬,恕即曲尽其事情”。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补充到,“心术端正,相当必要”。三位史学家都认为史家的个人道德在其著史当中具有重要作用。如果临文求敬,则是舍本逐末。

在《国史要义·史德》篇中,柳诒徵花大量笔墨讨论史之忠实,史的忠实与史家的史德有重大

^①钱茂伟:《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以郑郊〈史统〉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②汪文学:《正统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45页。

^③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78页。

^④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95页。

^⑤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岳麓书社2010版,第2页。

关系。因而,史家的史德就非常重要。柳诒徵对史家的史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史家需要达到“兼本末、包内外、合道德文章而一”的标准。史家要在平时修德,做到“执德”在“驭史”之前。这也体现了柳诒徵“德为先,德为基,治史必本于德”的思想。

那么,史家的史德是如何影响其治史的呢?因为“史家所重,尤在实录”,但“传疑传信,不乏其例”。由此可见,史家的史德,首先关乎到史的真实。其次,治史者不可以偏概全,不发疑辞,不为枉屈。柳诒徵的史德论还有其他所指,柳诒徵对顾颉刚的疑古言论,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病吾往史”等都有一定程度的批判。柳诒徵认为,他们“挟考据怀疑之术治史,将史实因之而愈淆,而其为害于国族也亟矣”。这也是史家“史德”的亏欠之处。但柳诒徵的如上言论在史学界也存在较大争议。即便如此,史家的史德尤显得重要。

(二) 治史以蓄德

在柳诒徵看来,人的道德观念是由史而来的。具体讲来,就是后人受到了前人经验之得失的启发,“所谓耸善抑恶,昭明废幽,广德明志,疏秽镇浮,戒惧休劝者,皆以史为工具而求成其德”。所以,人的道德的养成,“唯史之功用最大”。至于如何修德,首以《诗》《书》《礼》《乐》为植德之具,由于六经皆史,所以诗书礼乐亦是史。柳诒徵还认为,“吾国经史与文艺本一贯也”。他举例道,即便是我国的文学作品,也受到了儒家礼观念的深刻熏陶和影响。他谈到,“观吾国之文学,其根本无往不同。无论李、杜、白、韩、柳、欧、苏、辛稼轩、姜白石、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吴敬梓,其作品之精神,面目虽无一人相似,然其所以为文学之中心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理也。非赞美教主也,非沉溺恋爱也,非崇拜武士也,非奔走金钱也”。中国文学对其国人亦产生了如此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道德务趋和平温厚,不务偏激”“使自我与对象相融,而不徒恃感情之冲动”“其性情亦因以和厚、高尚,不致因环境之逼迫,无聊失望,而自隳其人格,以趋极端之暴行”。“感情热烈、意志躁扰之人读之……由狡愤而渐趋平缓,则冲融愉乐之味亦所以救济人生之苦恼者也”^①等方面。

(三) 读史为“求识”,即求得“史义”所在,而史义的核心又在于“礼”

何为“史识”?梁启超认为是观察力。刘咸忻以观史迹之风势为史识。

从孔子告子夏《尚书》的七义中即可窥探到“史识”与“史义”:“《尧典》观美,《禹贡》观事,《咎繇》观治,《鸿范》观度,《六誓》观义,《五诰》观仁,《甫刑》观戒。”在“观美、观事、观治、观度、观义、观仁、观戒”中,观可谓史识,而“美、事、治、度、义、仁、戒”可谓史义。这番对《尚书》诸篇的把握总结,体现了孔子的敏锐见识。这也是读史者具有“史识”的体现。

柳诒徵赞同刘咸忻“读史为求识”的观点。关于如何提高识力,柳诒徵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识生于心,而史之为钥”“稽之史而后悟”。首先对于历史的思索要用心,借用历史材料的钥匙细细体悟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规律或史书的书写原理。柳诒徵认为,如果摒弃前史,不信古人,“妄谓吾之识力能破除传统观念之藩,则事实所不可能也”。而“史识”与“礼”之关系在于,礼可以启发史识,“史策所书,咸本赴告及周家通礼,衡物异之轻重,视人事之敬惰,已可启发史识矣”。相反的,人们若能提高对于“礼”的理解与把握的程度,也能够加深其对历史的体认。

柳诒徵对史识理论的创新还在于他认为,治史之识是不局限于对已往之事的考察,而主要在于推究将来。也即史识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寻求读史的观察研究之法,而是“积之以求人群众之原则”,这在柳诒徵的历史因果律思想和历史进化史观中均有体现。

由上述而论,“史德—史识—史义”也构成了其内部的逻辑关系。史德可以启发史识,史识就是识得史义所在。而德与义都在礼的范畴内。

五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能看到,《国史要义》的十个篇章之间亦有千丝万缕、甚至是环环相扣的内部联系,而贯穿始终的仍然是“礼”。本文虽未直接谈论“史原”“史术”,但史原也即是史缘于礼,在本文第一章“一切学术皆从史出,儒学即史学”中已然谈到。至于史术的问题,柳诒徵认为

^①柳曾符,柳定生:《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版,第228页。

史术即史学,虽主要以资鉴性立论,探究历史之规律,但也多在于人事方面的尊礼、违礼导致的结果而言,故未作赘述。

有学者认为,“柳氏的论述触及到了传统史学体系的较深层面”,他将中国的史学传统与儒家的文化语境相结合,“确实点出了中国封建传统史学,史以儒家礼义名教为核心的实质”^①,这一观点颇值得重视。

关于柳诒徵的史学思想,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礼释史”,如向燕南谈到,“以礼释史是《国史要义》最重要的特点”。他进而谈到,“中国史学源于礼,又为礼之渊藪,故礼的精神尽在于史学之中”^②。另一种说法是张昭军认为柳诒徵是“为史以礼”,若以柳诒徵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一书来说柳诒徵是“为史以礼”,就是无可厚非的。但张昭军基于《国史要义》“礼由史掌,而史出于礼”,以及“史例、史统、史义、史联、史德、史识”立论,试图得出柳诒徵“为国以礼”“为史以礼”^③的学术思想,就有略失偏颇之嫌。原因就在于张昭军未关注到《国史要义·史化》中的问题,也即未对史的功能问题

予以重视。而且,“为史”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史的资鉴性,还在于史书中蕴含的礼,也即史的“释礼”性问题才是读史、治史的最后归宿。

综上所述,“为史以礼”与“以礼释史”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国史要义》的史学思想应该是一个“史—礼—化”的逻辑关系的过程。柳诒徵在龚自珍“尊史”和以史来“保存国性”^④的基础上,尝试以史来教育国人,他将经学、史学、礼学合一而论,建构起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力。我们可以认识到,“礼”实为中国文化的基因。因而,“以礼释史”才更为确切地能够说明柳诒徵的史学思想。但我们也应看到,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向世人传递传统史学文化精髓的同时,未能客观地看待其中的糟粕,这也带来了不少的遗憾。“以礼释史”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探究史学和礼学,揭橥我国国史的民族性、政治性,在特殊的时代能唤起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地维护以礼为核心的史学,也不利于我国史学的发展和对外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

An Analysis of Liu Yizheng's Academic Thought of Interpreting History Based on Rites

LI Xiao-h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Yulin University, Yulin 719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rites” and “history”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Commenting on Liu Yizheng's history book *GUO SHI YAO YI*, Xiong Shili points out that the author of the book is characterized by interpreting history based on rites. This topic is also seen in Liu's books, such as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other ten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Xue Heng*. He also tries to reveal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terlocking with the ritual class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Liu Yizheng's five academic theories behi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based on rites: all learnings originate from history; historiographers have a good command of rites; historiographers' writing method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rites; the essence of rites connects the dots of history through the classics and documents, and the historical value and function of classics is to promote “rite”.

Key words: interpreting history based on rites; *GUO SHI YAO YI*; ritual classics; historiographer; Confucianism

(责任校对 蒋云霞)

①张文建:《传统史学的反思——柳诒徵和〈国史要义〉》,《学术月刊》1988年第4期。

②向燕南:《关于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③张昭军:《柳诒徵“为史以礼”说的意蕴》,《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④马勇:《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84-88页。